

杜文玉◎主编

唐史论丛

第十三辑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
中国唐史学会 主办

唐史论丛

第十三辑

杜文玉 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史论丛(第十三辑) / 杜文玉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ISBN 978-7-80736-920-2

I. ①唐… II. ①杜… III. ①史评—中国—唐代—丛刊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0302号

唐史论丛(第十三辑)

杜文玉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汉中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标准书号 ISBN978-7-80736-920-2

定 价 50.00元

网 址 WWW.sqcbs.com

目 录

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	杜文玉 / 1
论唐人对高句丽及高句丽遗民的认识	拜根兴、侯振兵 / 15
武则天和亲突厥辩	卢向前 / 27
唐代儒家士人华夷观研究	樊文礼 / 33
唐高祖、太宗两朝外交思想初探	
——以“德”与“义”为中心	(新)王贞平 / 50
唐代长安城周围墓葬区的分布	程 义 / 71
《登科记考补正》拾遗补证	赵望秦 / 81
《天圣令·赋役令》丁匠条释读举例	
——兼与《营缮令》比较	牛来颖 / 103
世系·命运·信仰:唐末五代东海徐氏家族三题	胡耀飞 / 116
唐史臣刘知几的“官”与“职”	(台)赖瑞和 / 138
唐代江南地区诸都督府建制的演变	
——兼论唐后期节度使府建制	艾 冲 / 151
试论唐宋时期淮南盐业的发展	李天石 / 166
敦煌文献所见于阆玉石之东输	杨森、杨诚 / 184
杨吴、南唐政区地理考	周运中 / 215
中古时期医人的社会地位	宋丽华、于赓哲 / 234
礼法、礼制与礼仪:唐宋之际圣节成立史论	(美)陈怀宇 / 250
唐代官员服丧行为的全面制度化及其社会意义	赵 澜 / 280

唐代风筝与纸鸢辨识	王永平、刘冬梅 / 293
墓志所见唐代宗室之婚姻	刘思怡 / 301
唐睿宗豆卢贵妃史事考证	陈丽萍 / 318
释唐纪王沔王夔王墓志	贾二强 / 330
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	张重艳、孙继民、刘宏安 / 339
隋左武卫将军周法尚墓志研究	赵振华、徐有钦 / 351
《唐魏系墓志》考释	贾志刚 / 372

Contents

Northwest Geopolitical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u Wenyu / 1
On the Opinion of Tang People on Koguryo and Koguryo Adherents	Bai Genxing, Hou Zhenbing / 15
Arguments on Wu Zetian's Connections through Marriages with Turk	Lu Xiangqian / 27
On the Opinion of Han People and Minorities of the Confucian in the Tang Dynasty	Fan Wenli / 33
A Study on the Ideas concerning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Tang Emperors Gaozu and Taizong	(Singapore) Wang Zhenping / 50
Distribution of the Burial Section around Changan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g Yi / 71
Making Good Omissions and Deficiencies on <i>Supplements to Historical Records of Successful Imperial Examinations Candidates</i>	Zhao Wangqin / 81
Interpretation and Exemplification in Craftsman Item of Tiansheng Ling · Fuyi Ling—Compared to Yingshan Ling	Niu Laiying / 103
Pedigree · Fate · Belief : Three Issues on Xu Family of Donghai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Hu Yaofei / 116
The Official Ranks and Commissioned Posts of the Tang Historian Liu Zhiji	(Tai) Lai Swee Fo / 138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all Chief Military Commission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in the Tang Dynasty—On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Military	

Governor Manshions in the latter Tang Dynasty	Ai Chong / 151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alt Industry in HuaiNa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Tianshi / 166
Yutian Jade to the East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Yang Sen, Yang Cheng / 184
Research of Geography on Wu and Southern Tang Dynastie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Zhou Yunzhong / 215
Medical People's Social Status in the Middle Ages	Song Lihua, Yu Gengzhe / 234
Study on the Sage's Birthday Celebration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USA) Chen Huaiyu / 250
The Full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fficer's Mourning Behavior in Tang Dynasty	Zhao Lan / 280
The Kites and Zhiyuan Identifica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Wang Yongping, Liu Dongmei / 293
The Marriage of the Royal Family in the Tang Dynasty Having been Found in Epitaph	Liu Siyi / 30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 Events about the Highest - ranking Imperial Concubine Doulu of Emperor Ruizong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Liping / 318
Explanation of Epitaph of the King of Ji, the King of Mian, the King of Kui in the Tang Dynasty	Jia Erqiang / 330
Explanation of the New Discovery on Hong Quan Epitaph in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Zhang Chongyan, Sun Jimin, Liu Hongan / 339
Study on the Left Wu Wei General Zhou Fashang Epitaph in the Sui Dynasty	Zhao Zhenhua, Xu Youqin / 351
Textual Research and Explication on the Wei Xi Epitaph in the Tang Dynasty	Jia Zhigang / 372

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特点*

杜文玉

隋唐时期以长安为政治中心，其主要威胁来自西北，故这一历史时期的统治者对西北地区十分关注，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营西北，以消除外来威胁和确保京师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故西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隋唐时期三百多年来，由于中国实力的消长，西北疆域盈缩变化颇大，加之这一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外来势力十分强大，遂使得这里的社会状况异常复杂，矛盾冲突不断，直接影响到其在全国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研究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变化及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对从总体上把握和认知这一历史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西北疆域、民族及地缘意义

欲论述我国西北疆域的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只将本文所采取的主要标准叙述一下。孙祚民先生认为“应当以当时各该王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1]。也就是认为中国的疆域范围应该以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统一政权的疆域为标准。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也适合本文分析隋唐时期西北地缘政治的问题，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疆域或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疆域为准，则显然不适合本论题的研究。

在隋唐时期则以唐代在西北的最大疆域为准，通常认为唐代在西北的疆域最大时，其范围包括现今的新疆和北到巴尔喀什湖西至楚河流域以及帕米尔广大地区，当然也包括今青海、宁夏、甘肃等省区在内。其中以唐代西北地区最西部的疆域变化最大，帕米尔高原（即古葱岭）屹立在其南部，山高岭峻，白雪皑皑；中部有天山山脉，其南为以灌溉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绿洲农耕区，其北则为游牧生产方式为主的牧业区。阿尔泰山脉位于其东北部（即古金山），此山脉以外地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2009JJD770026。

区则不在西北地区的地理范围之内。唐朝疆域最大时曾越过帕米尔高原，达到其以西广大地区，大体包括咸海以东，伊塞克湖（热海）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以西地区，即楚河（碎叶水）、阿姆河（药杀水）、锡尔河（乌浒河）流域的广大中亚地区。

隋唐时期的西北疆域并不稳定，随着隋唐两朝对西域开拓政策的变化以及两朝实力的消长，而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具体情况后面还要详论，就不多说了。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这一历史时期中央王朝对这一广大地区的实际控制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能够直接进行行政控制的核心疆域区，在这一疆域区内，地方行政机构被纳入中央的直接管辖和约束之下，对中央的各项制度和政策都能严格执行；另一种情况则是核心疆域区的延伸部分，可以称之为羁縻疆域区，在羁縻疆域区内，大小不同的地方政权要承认自己是中央王朝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奉中央正朔，履行一定的贡赋和军事义务，表明与中央的臣属关系。^[2]唐代在这一地区设置的大量羁縻府州，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唐中央往往对其赋予极大的自治权，允许其保留原有生活和统治方式，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均可以世袭。在唐代最不稳定的疆域就是指这后一种情况。

西北地区在唐代聚居着众多的民族，除了汉族之外，主要有突厥、回纥（鹞）、吐蕃、黠戛斯（柯尔克孜）、吐谷浑、于阗、龟兹、疏勒、党项、粟特、吐火罗、波斯、大食等民族。在整个隋唐时期的三百多年间，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情况非常复杂，以上这些民族并非均长期定居在这里。其中长期定居在这里的主要是突厥、于阗、龟兹、疏勒、党项之人，除了党项的居住区偏于内地外，其余民族均分布于所谓的西域地区。吐蕃、回纥、黠戛斯、吐谷浑等民族都是后来陆续迁入的，比如吐蕃原居于今西藏地区，吐蕃王朝建立后，开始军事扩张，并与唐朝、大食在西域地区对抗，把势力推进到西域、中亚地区。由于吐蕃除了军事实力强大外，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并无任何优势，当其军事实力遭到削弱后，就只能从西域、河西一带退出，退缩到青藏地区去。回纥人在公元840年前，主要居住在漠北，有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天山南北仍然分布着回纥人，^[3]但数量当不会很多，其大规模迁入西北地区（包括河西地区）应是在黠戛斯击溃回鹘汗国之后。黠戛斯原来也居住漠北，长期在回鹘汗国的统治之下，其击垮回鹘汗国之后，乘胜追击逃亡的回鹘残余势力，于是也把势力发展到天山南北，并一度占据了安西、北庭。关于这一点，黠戛斯使者向唐朝通报击败回鹘时明确说明过，所谓“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4]。此后，黠戛斯势力虽然衰落，但并不影响其在这一带的居住。吐谷浑本来居住在今青海及四川西北、甘肃南部，吐蕃强盛起来后，击败吐谷浑，余众退至凉州，后被唐安置于灵州。唐德宗贞元时，吐蕃占据灵州，吐谷浑遂迁往河东，退出了西北地区，但仍有部分族人居于原处。

至于粟特、吐火罗、波斯、大食等国之人，除了粟特、吐火罗人长期居住在中亚地区外，波斯人曾在西亚地区建立过强大的帝国，并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帝国攻灭波斯。唐朝一时鞭长莫及，在大食兵退去后，吐火罗发兵立波斯王子卑路斯为王。龙朔元年（661年），卑路斯因不断遭到大食的进攻，奏请唐朝出兵救援。为了抵御大食，唐朝遂遣使在疾陵城（今伊朗与阿富汗交界的扎兰杰附近）设立了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成为唐朝管辖下一个羁縻府。不过其仍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大食攻破波斯都督府后，卑路斯流亡于吐火罗，并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逃到长安，被唐朝任命为左威卫将军，“其国遂灭，而部众犹存”^[5]。因此，在中亚一带长期有波斯人居住，至于在长安及中国内地的波斯人为数也不少。关于大食人在中亚的情况，学术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曾与唐朝、吐蕃在中亚地区展开过激烈的角逐，势力最大时也仅仅止于葱岭以西，从来没有达到葱岭以东地区。关于唐、大食、吐蕃在西域地区的纷争，对唐朝西北地缘政治的影响，在后面还有详论，就不多说了。

由于隋唐两朝均建都于长安，为了保证统治的稳定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两朝无不重视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从地缘的角度看，为了保障长安所在地区关中的安全，则首先要控制河西，并以此为基地，进而控制西域。所谓“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6]就是从地缘角度出发而提出的观点。唐朝初年，对其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东突厥，尚无暇顾及西北方向。当唐太宗灭亡东突厥汗国，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后，遂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西北。唐朝平定薛仁果、李轨，占据有河西地区后，初步具备了向西域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因为河西地区不仅具有拱卫关中的地缘意义，而且比较富庶，所谓“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甦矣。”^[7]正因为河西地区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从而为唐朝继续向西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唐朝征服吐谷浑，保障了通向西域的河西通道的侧翼安全，灭亡高昌国，则是为了扫除通往西域的障碍。此后，唐太宗在西域发展一路顺利，置安西四镇，降服西突厥，初步建立了唐朝在西域的统一地位。

关于西域地区在唐代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唐人崔融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武则天长寿年间，唐朝重新收复四镇，议者请弃之，崔融坚决反对，争论说：

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并南山抵葱岭，剖裂府镇，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内侮。高宗时，有司无状，弃四镇不能有，而吐蕃遂张，入焉耆之西，长鼓右驱，逾高昌，历车师，钞常乐，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今孝杰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若又弃之，是自毁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镇无守，胡兵必临西域，西域震则威憐南羌，南羌连衡，河西必危。

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无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则伊西、北庭、安西诸蕃悉亡。^[8]

崔融所说的这种情况并非虚言，安史之乱后，吐蕃据有西域、河湟，进而威胁关中，于是唐之边备近于邠、岐、泾、原之境，极大地压缩了唐朝在西北的政治空间，基本丧失了通过丝路所获得的经济利益。问题还不止此，为了防御吐蕃，唐朝动员了大量兵力布防于京西北诸州，形成了所谓的防秋之制，每年为此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使唐朝政府不堪重负。

唐朝在葱岭以西、锡尔河、阿姆河流域等中亚地区的经营，目的主要在于保障葱岭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的安全，因为这一地区是唐朝在西域的有效统治区，意义十分重大。这一地区民族矛盾复杂，除了唐朝与大食对抗外，又掺入了吐蕃、突骑施因素，致使争夺十分激烈。唐朝与大食经过长期的斗争，双方实力此消彼长，唐朝的政治优势逐渐丧失。^[9]天宝十载（751年）的怛罗斯之战，是唐朝对大食在中亚势力的一次反攻，目的在于防止其威胁唐朝在葱岭以东的统治。^[10]结果唐军战败，尽管大食没有乘胜东进，但唐朝显然已失去了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优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彻底退出中亚地区，大食完全控制中亚地区，但是由于吐蕃的抵御，其势力仍然没有越过葱岭。

二 西北地缘因素变化的阶段性

隋唐两朝在西北地区前后经营了三百多年时间，随着中外及西北民族关系与实力的消长，中原王朝在西北的疆域也出现了盈缩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并且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在隋唐两朝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变化。

第一阶段：隋朝至唐高宗时期。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由于专注于国家的统一事业和东北亚地区的稳定，虽与西突厥有所联系，然仅仅是为了牵制东突厥而已，还谈不上对西域地区的经营。隋炀帝即位时，统一大业已经完成，军事、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于是开始重视对西域地区的开拓。大臣裴矩向炀帝进献《西域图志》，“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将通西域，西夷经略，咸以委之。”^[11]隋炀帝经营西域的事业首先是从征服吐谷浑开始的，与文帝时期对吐谷浑的用兵不同，这时用兵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保证河西的安全，而是为了打通与西域的交通线。^[12]为此隋朝采用了联合铁勒、东突厥，孤立吐谷浑的策略，在大业四年至五年间（608-609年），击败了吐谷浑伏允可汗，在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又攻占了伊吾，打通了天山南北道，大业六年（610年），正式设立了伊吾郡，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加强隋朝在西域的控制，炀帝发配流人屯垦戍守，在郡之下设置县及其以下军事行政单位，所谓“置州（郡）、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

之。”^[13]隋朝在西域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加强了西域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为了进一步经营西域，炀帝还派裴矩联络西域各国，在大业年间相继有三十余国来朝，于是炀帝专门设置了西域校尉和安西都护之职，以镇戍西域之地。^[14]至于这些职官与隋朝设在当地的郡县之间的关系，是否与唐朝在西域实行州县制度与都护府及羁縻府州并行的管理模式相似，由于史料欠缺的缘故，不好论定，然两者之间肯定有某种联系，存在前后承袭关系也不是不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隋朝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仅局限于西域东南部地区，由于隋炀帝很快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高丽，从而停止了对西域地区的经营步伐。

唐朝建立以后，在高祖统治时期主要面对的是如何结束割据、统一全国的问题，尚无暇顾及对西域的经营。唐太宗即位之初，面对势力强大的东突厥汗国，使其不得不首先解决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唐太宗灭亡东突厥后，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西北，他首先出兵灭掉了河西走廊以南的吐谷浑，初步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通道。此后唐政府积极介入西域事务，通过册立西突厥泥孰系为可汗的方式，以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但是唐朝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于是便不得不将政治手段放在次要地位，而把军事干预提到了首位。贞观十四年（640年），唐朝出兵灭亡了高昌，彻底打通了西域的通道，为唐军直接进入西域创造了条件。灭亡高昌时，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畏惧唐军强大，率军向西撤退千余里，突厥叶护阿史那步真率部投降了唐朝。此战后唐朝在高昌设立了西州，在突厥可汗浮图城设立庭州，加上此前设置的伊州，这样就牢牢地控制了西域东部地区。为了统一管理西域事务，唐太宗还在西州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这一切标志着唐朝在西域已经建立了稳固的基地，同时也扼住了西域通往内地的门户，为进一步经营西域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唐军在贞观十八年（644年），攻讨焉耆。二十二年（648年），又平定了龟兹。实际上唐朝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都已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只是由于唐太宗过早去世，才没能完成控制整个西域的任务。

唐高宗时期是唐朝在西域全面建立统治秩序的时期，最主要的标志就是比较普遍地设置了羁縻府州，由西域各国君长或酋长任都督和刺史，分别隶属各都护府。其实设置羁縻府州早在贞观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如贞观二十三年，设置了瑶池都督府，命西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都督。同年还设置了新黎州，以西突厥人菴钵为刺史。^[15]唐高宗即位以来，随着对西突厥战争的胜利，就已经陆续设置了一些羁縻府州，在西突厥政权的灭亡后，唐朝遂大规模地在西突厥故地设置羁縻府州。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移到龟兹，正式设立安西四镇，并增强了在西域的军事力量。接着唐朝先后四次在西域大规模地设置羁縻府州，^[16]将威海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包括吐火罗在内，地跨天山南北、葱岭东西，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唐朝在广大西域地区实际上实行两种不同体制的统治方式，一种是以伊、

西、庭等州为正州的体制，其管理方式同于内地正州；另一种则是羁縻府州体制，这些府州分别统属于各都护府，如濠池都护府、昆陵都护府等，总统于安西大都护府，标志着唐朝在西域统治秩序的最终确立。

第二阶段：武则天至唐玄宗统治时期。自武则天时期以来，由于吐蕃实力不断强大，其势力不断地向西域地区渗透，开始了与唐朝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斗争。在这一时期随着大食帝国国力的不断强大，其势力也向东发展，从而与大唐帝国在西域地区发生碰撞，从而使这一阶段西域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斗争也十分激烈。大体情况如下：

其实早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吐蕃就已经不断地挑战唐在西域的统一地位，一度攻陷了十八州之地，并进而威胁安西四镇。唐朝派薛仁贵为大将，率军从青海出击吐蕃，结果在大非川战败，只好约和而还。于是吐蕃攻陷了龟兹，把安西四镇控制在手中。此后，双方为争夺四镇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四镇曾反复易手。高宗末年，吐蕃利用唐军镇压阿史那车薄的机会，武力占据了四镇的大部。武则天临朝后，又采取措施恢复了对四镇的控制，尤其是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军大破吐蕃军，收复安西四镇后，虽然吐蕃采取了种种办法，包括政治谈判的方式，希望再度控制四镇，但都没有得逞。此后，吐蕃陷入内乱，无力与唐在西域争夺，西域形势才稳定下来。在武则天晚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除了安西都护府外，在长安二年（702年），又设置了北庭都护府。需要说明的是，北庭都护府创建之初，隶属于凉州都督府，后又改隶于安西都护府，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始升格为大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的羁縻府州。^[17]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分别管辖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这种二元化的军府管理体制的形成，标志着唐朝在西域管理体制已经完善化。

8世纪初，唐朝陆续设置了河西、陇右等节度使，加强了青海、河西一线的防御，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侵扰，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吐蕃遂把主要精力放在西域，首先武装占领了小勃律，作为进攻安西四镇的大本营。又建立与大食、突骑施的联盟关系，共同对付唐朝，当时“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18]唐朝为了反击吐蕃的蚕食，天宝六载（747年），安西都护高仙芝率军一举攻破小勃律，击败了吐蕃军队，留重兵戍守。天宝八载（749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又攻破了吐蕃在青海境内的重要据点石堡城，进一步稳固了唐朝在西北地区军事态势。

大食本来居住在阿拉伯半岛，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不断地介入中亚事务，成为与唐朝争夺这一地区的主要对手。从公元673年起，大食以呼罗珊为基地开始向中亚地区进行征服战争，从而与唐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对付大食，唐朝采取支持突骑施苏禄政权的政策，使其为唐朝防守边境。突骑施挫败了大食，将其势力赶出了河中地区。但是苏禄强大了以后，不甘心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反

过来围攻疏勒，迫使唐朝又与大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禄。公元737年，大食军队在哈里斯坦附近的会战中，大败突骑施与粟特人的军队，从此突骑施便衰落下去了。大食人控制了中亚地区后，与唐朝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天宝七载（748年），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军进攻石国，石国王子向大食求救。大食派吉亚德·本·萨利赫率军出征，天宝十载（751年），双方军队在怛罗斯展开会战，唐军大败。但是大食并没有乘胜东进，也从来没有越过葱岭到达以东地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在中亚地区仍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一地区的一些小国仍然向唐朝进贡，并保持着宗藩关系。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唐朝在西域的主要对手仍然是吐蕃，而不是大食。由于唐军在天宝时期对吐蕃的一系列胜利，使其在西域的势力达到极盛，故《资治通鉴》说：“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阊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9]

第三阶段：从天宝十五载至唐朝末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朝不仅无法在西域与其他势力争夺，而且还被迫大量地从这里抽取军力，调入内地参加平叛战争。史载：“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20]不过吐蕃这时所占据的主要为河、陇一些州郡，安西四镇及北庭仍在唐军占据之下，虽然有不少小国臣服于吐蕃，也不是吐蕃军事攻伐的结果，而是唐军撤退后这些小国不得不作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西域地区政治形势还是有所反复的。^[21]即使河西诸州也不是一下子就落入吐蕃之手，如瓜、沙、伊、西、凉、甘等州，都是经过了较长时期的激烈攻战，才陆续被吐蕃攻取。

由于安西、北庭仍在唐朝手中，吐蕃虽然攻占了河、陇一些州郡，却不敢放胆进攻关中，原因就在于其发挥了牵制作用。所谓“安西、北庭，人性骁悍，……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22]因此，吐蕃全力攻取安西、北庭乃是必然之事。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攻占沙州。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陷了北庭。贞元八年（792年），西州落入吐蕃之手。安西陷落的具体时间，史书缺载，由于其兵力强大，又有回纥及周边小国的支持，所以被吐蕃攻陷的时间最晚，有人推断可能失陷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23]这样，在安史之乱爆发五六十年后，吐蕃终于在西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此后，在西域地区的角逐便在吐蕃、回纥、大食之间展开了。

关于吐蕃与大食在西域地区的对抗，《旧唐书》卷一九八《大食传》记载说：“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这是指公元786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继位后，派兵东征吐蕃，吐蕃为了保护其在中亚的利益，只得全力抵御。^[24]客观地看，正因为吐蕃的坚决抵抗，才阻止了大食的继续东进。至于回纥在8世纪中叶居住在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

山，北接贝加尔湖，南与唐朝接壤的广大区域内。^[25]回纥势力强大起来后，遂逐渐向天山南北渗透，并与吐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安史之乱后，阻隔在西域的唐军之所以能够坚持抗击吐蕃，其中回纥的援助是原因之一。此后，回纥一直与唐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除了出兵协助唐军平定安史叛军外，其也是西域地区与吐蕃抗衡的主要政治势力。直到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回纥于贞元四年改名回鹘）被黠戛斯击败，被迫西迁，其势力才衰落下来。不久，吐蕃由于内乱和长期的征战，实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很快也衰落了，不再构成对唐朝的威胁，但此一时期的唐朝也衰弱不堪，也不具备恢复在西域统治的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唐武宗时期，唐朝利用吐蕃内乱，先后收复清水、原州、石门等六关，又攻取了安乐州、萧关、秦州、扶州。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沙州首领张义潮起义，并献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大中十一年（857年）唐朝收复河州、渭州，咸通四年（863年）光复凉州。所有这一切胜利不过是唐朝的回光返照，然对传统丝绸之路的畅通来说，其意义仍是不可小视的。

总的来看，第一阶段是中原王朝全力开拓西域地区，并取得了较大成就的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由于整个西域地区并无十分强大的政治势力与中原王朝抗衡，所以中原王朝在西域的行动基本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前后用了七八十年时间才在西域建立了统治秩序，但那主要是因为王朝更替以及唐初扫平割据、进行统一全国战争的缘故，并非是敌对势力强大。西突厥大而不强，当中原王朝势力没有进入西域时，其可以在这里称霸称王，当中原王朝全力经营西域时，西突厥便很快覆亡了。

第二阶段，由于出现了吐蕃、大食等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使唐朝在西域地区的经营变得异常艰难，争夺呈现出白热化的局面。这几大政治势力在亚洲腹心地区的争夺，证明了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当然争夺丝绸之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是这一地区成为列强角逐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一时期唐朝仍具有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加之大食并未全力东进，所以吐蕃在西域的争夺战中并未占上风，而唐朝仍然有效地控制着这一广大区域。

第三阶段，由于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彻底打乱了唐朝在西域地区的部署，随着唐军的大量内调，吐蕃势力坐大，在西域的争夺占据了上风。需要指出的是：吐蕃虽然占据河西、西域不少地盘，但其从来都没有如唐朝那样控制整个西域地区，除了吐蕃统治政策不当、剥削沉重、人心不附的原因外，大食、回纥对其的制约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吐蕃清除了唐朝在西域最后一个据点后，其国力也已经衰弱不堪，走上了分裂衰亡的道路。西域地区另外两个势力集团，大食与回鹘也相继衰落下去了。因此，唐朝晚期的西域已经不存在足以统治整个地区的强大政权，又回到了以前那种小国寡民的状况，即使有少数政权实力稍微强大一些，也不具备能够控制整个地区的实力。这正是唐朝晚期仍然能够在长安继续维持其

统治，而没有感到来自西方强大威胁的根本原因。

三 西北地区对隋唐地缘政治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隋唐两朝在西北地区的疆域明显呈现出不稳定性的特点，这里所说的疆域实际上就是指隋唐的政治边界，与近现代意义上具有较为精确划分标准的边界不同的是，古代中国西北部的边疆界线实际上往往是“模糊”的，所指的往往是地区或地域概念，即历史上所谓的西域。^[26]造成隋唐两朝西北疆域不稳定的原因，除了这一广大区域长期处于“羁縻”状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这一地区对当时几个强大的政权来说均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因而争夺十分激烈，随着各方军事实力的强弱变化，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疆域也随之出现盈缩变化。尽管如此，通过上一小节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出，西北地区包括古代所谓的西域地区在隋唐两朝的大多数时间内，主要是由中原王朝控制着的，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是中原王朝的影响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有直接的关系，正因为中原王朝高度重视，所以才会下气力进行经营，从而使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与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原王朝之所以重视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则与这一地区在隋唐两朝具有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有关。

关于西北地区在隋唐两朝所具有的重要的地缘意义，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这里只就西北疆域盈缩变化对隋唐两朝地位和王朝盛衰的影响，略陈管见。

这里所说的地位是指隋唐两大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和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隋唐两朝尤其是大唐帝国，在这一时期的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表现在大唐帝国所具有的先进科学技术、繁荣的文化、强大的经济实力上，而且也表现在其所具有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阔无垠的国土上。所有这些方面都对当时的世界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也使其对大唐帝国产生了敬畏心理和极大的羡慕。

西北地区面积广大，当其完全为唐朝所统治时，包括今中亚各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一部均在中国境内，西部边界与今伊朗相接，从而对西亚及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再加上漠北、漠南的广大疆域及富庶的黄河、长江流域，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疆土最大的帝国。当此之时，都城长安从地理位置上看，真正地居于天下之中，毫无位置偏西的感觉。当时人也对唐朝广阔无垠的疆土感到无比自豪，所谓“开远门揭候署曰：‘西极道九千九百里’，示成人无万里行也。”^[27]当安史之乱后，唐朝丧失了西北地区的广大的疆土后，使其泱泱大国的形象遭受到极大的削弱，不仅西北诸国、诸民族来华的次数大大减少，甚至还影响到东亚诸国的行动。如日本在唐前期对唐帝国幅员之辽阔感到惊叹，但是在唐后期当其使者看到中国疆土内缩，军阀混战的状况后，遂于公元838年最后一批遣唐使返国后，便

断绝了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因此，疆土面积的大小，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大国的标志，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其世界地位，试想一个连自己的疆土都无法保卫的国家，还能称得上世界性的大国吗？

由于西北地区与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在地缘上相近，所以这一地区对维护长安的安全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则大唐帝国就有了战略纵深，长安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则长安随时都处在军事威胁之下，所谓“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28]吐蕃甚至一度攻陷了长安，这是隋唐时期三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为了加强对长安的保卫，唐朝不得不从中原地区抽调大量的兵力，布防在京西北地区。当广大西北地区为唐所控制时，唐朝对吐蕃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当失去这一地区后，唐朝则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态势，直到吐蕃衰亡前一直没有得到改变。

西北地区的盈缩变化还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当唐朝有效地控制广大西北地区时，各国各族使者纷纷向唐朝表示臣服，拥戴大唐皇帝为“天可汗”，唐朝针对其建立了羁縻体制进行统治。当唐朝失去这一地区时，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羁縻体制基本崩溃，内忧外患不断。为什么控制西北地区对唐朝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缘意义呢？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录之如下：“北方游牧政权和中原农业王朝的对抗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始终，前者一直是后者最大的威胁。从秦朝开始，处于农业经济与牧业经济分野带上的长城沿线大致成为双方较为明确的分界线，也就是两者相对稳定的政治地理边界。但是，这条长城边界线对于中原农业王朝而言实际上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防御意义，它在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真正阻挡住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脚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南、北力量均衡并发生对抗和战争以致正常交往中断的形势下，如果说相对自给自足的中原农业王朝还能够维系自己的统治的话，那么对于经济生活单一的北方游牧政权而言，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西域地区不仅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物力与人力资源，而且也为其与中原王朝周旋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成为游牧政权事实上的战略大后方。”尽管有时中原王朝能够深入漠北，也无法彻底根除游牧民族的威胁，最终还得回到被动防御的态势上来。“当单纯地经营北方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中原王朝才逐渐意识到河西和西域地区对于双方，尤其是对于北方游牧政权的战略性意义。因之，经营西北边疆也就成为中原王朝必然的选择，西北边疆的拓展于是付诸实施。无论是汉武帝开河西“隔绝羌胡”，还是张骞“凿空”西域，其战略目标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阻断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命脉，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西北边疆拓展的初始意义正在于此。延至北朝、隋唐，中原或内地王朝与柔然、突厥争夺西域，其意义也在于此。”^[29]至于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北地区，则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就不多说了。